

# 从浅攻到蚕食：论章粦的军事构想与实施

□钱俊岭

摘要：章粦，建州蒲城（今福建蒲城）人，北宋哲宗时历任环庆路、泾原路安抚使，主持西北军务，颇有战功，为“一时良将”。哲宗朝是北宋对西夏在军事、外交方面的战略转变时期，在元祐年间，章粦的防御战略抵御了西夏来犯，而绍圣、元符年间，他的进攻战略使得北宋军队大举反攻，拓边西北。本文对章粦在不同时期所陈军事战略以及具体实施进行探讨。

关键词：章粦；浅攻之计；弹性防御；筑垒；逼夏

作者简介：钱俊岭（1979-），男，回族，河北唐山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200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

章粦，字质夫，建州蒲城（今福建蒲城）人，生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卒于徽宗崇宁元年（1102），享年76，谥庄简，改谥庄敏，著有《杏花村集》，今佚散<sup>[1]</sup>第七册，第86页。观其生平，显著于史者当在哲宗朝，此时也是北宋政府对西夏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时期。此间，章粦历任环庆路、泾原路安抚使，主持西北军务，颇有战功，其所陈战略部署大多得以采用，使得北宋军队开始了对西夏的战略反攻。至哲宗朝末年，宋军已大举拓边，占据了天都膏腴之地。章粦是北宋战略转变时期颇为重要的人物之一，然而，学界对于此人关注并不多，只有曾瑞龙、江天健、米寿祺三位先生有所提及<sup>①</sup>。笔者企图通过对《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相关记载的梳理，对其战略构想及其实施情况略陈管见，并通过对章粦的研究，进一步认识哲宗朝军事战略转变的过程。

一般来讲，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必定要服从并服务于该国的“国家战略”，同时又要受到其他“战略元素”的影响，故而战争不是孤立的行为，是“国家战略”实现的一种手段<sup>[2]29</sup>。哲宗元祐、绍圣之际，新旧党人更迭频繁，他们所奉行的治国方针大相径庭，致使北宋对西夏的军事、外交政策反复不定。

## 一、哲宗朝军事战略转变的背景

神宗死后，哲宗继嗣，旧党成员相继归朝，他们对熙丰时期北宋朝廷所取得的军事成

就大加贬斥，认为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六寨皆“非要害之地”，“非肥良耕垦之地”，徒费国用，“坐困中国”，“守之无所得，弃之不足惜”，纷纷上疏表示宋朝应该以六寨换回永乐陷落军民。一时间“弃地弭兵”的论调甚嚣尘上。元祐四年（1089）十一月，宋廷最终“捐葭芦、安疆等四砦予夏，使归其永乐之人”，并“诏边将毋生事”<sup>[3] 10589、328</sup>。从整体来讲，从元祐元年至四年，北宋在军事上奉行的是“以土地换和平”的消极战略。但双方在疆界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分歧，致使西夏扰边不断。基于现实的考虑，北宋不得不对西夏作出战略调整。元祐六年（1091），范育率先上疏，“欲乘此进堡寨”，但遭到朝臣的普遍反对，范育虽谙熟军事，却不懂政治，他反复强调“筑寨进剿”，打破了旧党成员不主动进攻西夏的底线，“遂下诏约束育等”<sup>[4]11043</sup>。与此同时，吕大忠陈“坚壁清野”，范纯粹“乞诸路更守迭出”<sup>[4]11165</sup>。

## 二、章榘的防御部署及其施行

### （一）行“浅攻之计”攻扰西夏

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元祐六年（1091）九月壬辰，章榘陈攻守之策。对当时战局分析之后，他认为对西夏大举作战的时机并不成熟，“为今之计，宜敕戒诸路，休养兵民，修严警备，事事整办，毋妄作轻举”，应以防守为主要战略部署，西夏小股部队侵犯则“使城砦及诸将各据地分，驱逐翦除之”，若“举国入寇，则坚壁清野，勿当其锋”，但单纯的被动防御不能抑制西夏军队，宋军应该利用对地理的熟悉，事先“遣将据要害便利之处”设伏，审察西夏前军已远，“分头讨击之，或翦其尾，或邀其归路”，使夏军首尾难顾，陷入混乱。同时，章榘根据西夏军队“无城郭之固，无营卫之兵，啸聚则为用，既散则难集”的特点，谏言北宋政府对待西夏应该施行“扰耕践稼”，“为浅攻之计”。在他看来，北宋应将西北军务委于各路安抚使，让他们“审度而为之”，并且在与西夏作战时，朝廷“不必全用正兵”，应“选募土兵，参杂于蕃兵之间”，由于他们长年生活于此，对当地地形、气候非常熟悉，“最为可任”。最后，章榘还认为，西北五路应协同作战，如西夏举兵攻取某一路，其他四路“皆出兵策应牵制”，在施行“浅攻之策”时，五路之师应“更出迭入”<sup>[4]11131-11132</sup>。

章榘所述战略部署及其实施方案，较为切实可行。首先，从政治角度来讲，它是在旧党政治方针允许的范围之内，虽然也提及了越境作战，但却是为了干扰、坐困西夏军队，并不是要开疆扩土，确保了其计划得以实施。其次，从经济角度来讲，浅攻之策“要义在于‘浅’，不用特意搞补给和调发民夫”<sup>[5]56</sup>，消除了旧党成员，诸如苏辙所担心的战争开支问题。最后，从军事角度来讲，章榘主张对北宋边境300里之内的西夏军队驻泊地施以“浅攻”，不仅可以干扰西夏正常的农业生产，破坏粮食补给，并且牵制了西夏军队的主要精力，使其无暇南下，降低了北宋沿边地区的威胁；北宋军队“由于攻击纵深不大，比较容易安全撤回”<sup>[5]56</sup>。如范仲淹所说，“纵出师无大获，亦不至有它虞”<sup>[6]1463</sup>。“在消极防御的战略影响之下，宋军比较擅长守城战”<sup>[7]336</sup>，而城寨之间、路与路之间协同防御的能力较差，西夏军队来时，宋军不能迅速、有效地进行反击。如元祐二年（1087），西夏军队围攻镇戎军，“十一将兵尽在城内，蕃众掳掠三百里以上，如行无人之境”，给北宋边防带来很大隐患<sup>[4]11222</sup>。意识到宋军的弊病，章榘认为西北诸路应联合作战，“更守迭出”，压缩了西夏军队的纵深空间，降低了北宋的边防压力。

对于章榘所陈攻守之策，北宋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四天之内连发三道诏书。元祐六年（1091）十月庚申，枢密院言：诸路之间传递敌情的烽火台“极为要便，理当复行兴置”，哲宗立即下诏陕西、河东诸路经略司“横烽如果利便，即行修立”，以便加强诸路之间的联系<sup>[4]11146</sup>。次日，即十月辛酉，皇帝诏令陕西、河东经略司：如有可乘之机，对北宋境外200里内的西夏屯聚部队以及聚居于此的党项部落“痛行讨杀”，在战术上则施行“倏往忽归之计”，“及令诸路兵马更出迭归，使贼奔命不暇，早致困弊”<sup>[4]11147</sup>；十月癸亥，北宋政府再次诏令陕西、河东经略安抚使司：西夏若举兵专攻某一路，该路兵力确实难以枝梧，“即行报关邻路牵制”，并于“别路潜伏重兵，俟我出兵牵制”，防止西夏乘机侵犯他路<sup>[4]11148</sup>。从这三道诏书的内容看，北宋在西北的军事部署是完全按照章榘所陈奏议行事的。

元祐六年（1091）十一月己酉，环庆路都监张存、第二将张诚、第三将折可适率兵攻讨韦州辣韦疆、安州川霄、柏州及延州祖逋领不经掌等处贼众<sup>[4]11175</sup>。据史料所载，韦州是西夏静塞军司的驻泊地，不仅是重要军事要塞，“而且在当时尚为富庶之地”<sup>[8]126</sup>，且距北宋边境较近。环庆路对近边驻泊的敌军给予军事打击，说明章榘的浅攻之计在实际中得到了应用，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此战获首级1148，生擒2人，“诸路浅攻之策，盖自此始行”<sup>[4]11147</sup>。凭借此战，章榘在军事上初露锋芒，也使他得到了宋廷的信任，确立了其在西北军事防务中的地位。

## （二）“合三路之众”协同攻守

面对沿边军事基地屡受重创的现实，西夏也对自己的战略战术作出了相应的调整<sup>②</sup>。据范纯粹称：西夏军队在北宋边境百里之外分几处部署人马，而每一处看似兵力不多，诱使宋军来攻，待其来时，西夏军队则集结全部人马与之作战，兵力不下三五万人；而宋军只是一路人马，专攻西夏某一处，兵力不过一万，在局部战场上，西夏兵力占居了相对优势<sup>[4]11188</sup>。

西夏战术上的改变，虽未给北宋造成损伤，但引起了宋廷的高度重视。章榘分别于元祐七年（1092）正月壬子、二月辛酉，上疏论及西北防务<sup>③</sup>。他再次重申了坚壁清野虽是“自古良将御戎之策”，但此法“足以备寇尔，未足以制寇也”<sup>[4]11208-11209</sup>，故而“不可以只循一轨”<sup>[4]11222</sup>。章榘以熙宁三年（1070）西夏侵犯环庆路、元祐二年（1087）围攻镇戎军为例，说明这两次惨败非是宋军不坚壁清野，而“官兵尽在城内”，西夏兵来“无以制之”，其撤离时又不得而知，“出兵前去追袭，不见一人一骑”<sup>[4]11222</sup>，致使北宋边患不断。所以，他认为各路不应把兵卒全部驻泊于城寨之内，而令精锐人马“择利驻扎高险远望，即不聚一处”<sup>[4]11220</sup>，若是西夏来犯，则避实就虚，不与之争锋，施行敌追则退，敌攻则扰，敌退则打的战术，牵制西夏主力，分散其力量，西夏若合兵攻略，宋兵应“伺隙而击其虚”，使其“战则不能，攻则不敢，钞掠则无获，不过三两日，自当引去”<sup>[4]11221</sup>。

同时，章榘认为，浅攻“止可为西贼皮肤之患，不能病其心腹”<sup>[4]11208</sup>，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对其进行军事打击——以攻为守。所以，他再次强调西北诸路协同作战的重要性，认为应将鄜延、环庆、泾原三路联合起来构建局部战区，并在鄜延、泾原各抽调“不系边面所驻之兵”<sup>[4]11210</sup>，和环庆路兵卒，共计7万余众，组成一支机动部队，如宋军对西夏进行军事打击，则邻路（指鄜延、泾原）之兵“辍假五七日或十余日，并力攻讨”，战后“则复归本道”。最后，章榘指出“合三路之众，深入攻讨”<sup>[4]11210</sup>，不待时日，西夏便“自当

面缚款塞”<sup>[4]12210</sup>。

章榘所陈战术方案改变了北宋分兵驻守城寨的部署。首先，“避免将部队分散在前沿漫长的战线，也避免作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集中兵力构成局部战场的相对优势，“击溃或歼灭入侵的敌军”。其次，宋军“可以凭对地形的熟悉，隐伏一定兵力，或派出一个迂回部队于敌人入侵军的侧后，配合正面的大部队同时前后夹击”，使其首尾难顾。再者，防御“并不必然意味着完全放弃前沿抵抗。若没有给予敌军相当的迟滞、骚扰和杀伤，则在纵深处会战和反击的效果未必很大……但却要配备较机动化的野战军，和一体化的指挥机制”<sup>[9]225</sup>。元祐七年（1092）宋夏洪德城之战，北宋完胜，此足以说明章榘战术方案的可行性与实效性。对于此战，曾瑞龙先生已有专文详加论述，此不赘叙。

### 三、章榘进攻体系的构想及其实现

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有复熙宁、元丰之意”。1094年改元绍圣，意为“遵照先贤之道”<sup>[5]138</sup>，“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复之”<sup>[3]13711</sup>。变法派重新得到重用，政坛的这一变化，引起了北宋对西夏战略部署的再次改变。此时章惇已出任宰相，曾布为枢密使，他们放弃了元祐时期宋廷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而改为大举拓边。在此期间，章榘基本是以夺取天都、控扼横山为战略目标，而在战术上则采用了步步为营、“据形胜以逼夏”的蚕食策略。

早在元祐七年（1092）六月壬申，时为环庆路经略使的章榘即谏言：扼西夏之咽，伐西夏之谋者，今之上策“惟择地筑垒，迫近横山，以渐困之”<sup>[4]11308</sup>，但此建议在当时并没有得到采纳。元祐八年（1093）三月，朝廷以章榘在洪德城之战后“所上死亡数不实”、“又纵贼使全而归”、“户部侍郎非榘能任”等缘由，令其知同州<sup>[4]11471</sup>。此皆为欲加之词，而章榘遭到惩处的真正原因是当时的北宋政府并不希望诸路军队主动出击，故有是命。

哲宗亲政之后，“访以边事”，章榘对合旨，朝廷任命他为泾原路经略安抚使，知渭州。他上任之后即合泾原、环庆、熙河、秦凤路兵马修筑了平夏城、灵平寨<sup>[3]10589-10590</sup>。从战略意义上讲，平夏城、灵平寨位于葫芦河川附近，该地区基本为冲积平原，“原野广阔，别无山谷巉嶮之患，资借水草，民兵易集”<sup>[4]11523</sup>，是“西夏南下入宋的重要孔道”<sup>[10]194</sup>，并且葫芦河川西北为天都山，沿天都山南下一百五十里为镇戎军<sup>[11]一八下《西蕃地理》</sup>，亦可入渭州，庆历年间，元昊曾在此经营，成为进攻北宋的重要军事据点；再者，该地尽为膏腴，可畜牧耕稼，是优良的牧马地与农业区，被西夏人称之为“唱歌作乐田地”<sup>[4]11524</sup>，具有颇高的经济、军事价值，必将成为双方角逐之地。

在筑城过程中，章榘一方面“阳缮理他堡壁数十所，自示其怯”<sup>[3]10590</sup>，并对部将扬言“吾老，能怯守而已，不知其他”，而另一方面他却“阴具畚锸，转刍粮，治楼橹械器”<sup>[4]11546</sup>，集熙河、秦凤、环庆、泾原四路人马进驻葫芦河川，于石门峡江口、好水河南岸修筑城寨。同时，他希望“鄜延、河东，广张声势，为深入之计”，以牵制西夏军队。宋廷即刻令熙河兰岷路经略司“候见泾原路举动月日”，疾速大作渡河讨荡声势，“务要分挠贼计”，此外“令鄜延、河东经略司，依泾原路所奏施行”<sup>[12]兵八之三三</sup>。绍圣四年（1097）三月六日，西夏点集甘州、右厢、卓啰、韦州、中寨、天都六监军十余万人来犯，但在诸路之师的应援之下，宋军很快就打退了西夏军队，确保了二城的顺利竣工。平夏城、灵平寨的成功修筑不仅切断了西夏军队南侵管道，缓解了镇戎军的边防压力，而且占领西夏的农

牧产区，控制敌人的粮食补给源，“标志着一连串宋军攻击的开始”<sup>[5]147</sup>。城成之后，哲宗皇帝大喜过望，即刻擢章榘为左朝议大夫、枢密直学士。

为避免新筑二城孤立无援，防止所占耕地被西夏军队抄掠之患，同时，为了更有力地控扼西夏南下入侵的道路，在绍圣四年（1097）六月至元符元年（1098）六月，泾原路在章榘的主持之下又相继修筑了镇羌、九羊、通峡、荡羌四寨，与此同时“环庆、鄜延、河东、熙河皆相继筑城，进拓其境”<sup>[3]10590</sup>，诸路共同进驻天都，形成了对西夏军事据点的三面合围之势，而且占据膏腴之地，削弱了西夏实力。

在绍圣、元符年间修筑堡寨的军事行动中，章榘的“据形胜以逼夏”战术得到了彻底的执行。另外，从宋军的军事行动中可以看出，西北诸路形成了以泾原路为核心的局部战区，章榘可按照自己的战略部署节制诸路人马，使得宋军更有效、灵活地打击来犯敌军，证明了诸路之间协同作战能力得到了加强；再者，北宋政府修筑堡寨活动表明了宋军的军事战略由此前的积极防御转为全面进攻。

西夏政权为了夺回丧失土地，扭转不利战局，同时也是为了转移政治斗争的矛盾，元符元年（1098）十月十日，西夏梁太后与乾顺亲帅大军30万，号称150万，围攻平夏、灵平、镇羌、九羊、通峡、荡羌六寨。战前，章榘获此情报之后，颇为自信地说“贼不来则已，来必堕吾策中。”<sup>[4]11976</sup>章榘以郭成充任泾原路第十一将、知平夏城，成功地抵御了西夏14日的猛烈攻势。此次宋夏决战的成功不仅在于此，而且是“一场组织完善的战役”<sup>[5]149</sup>，西夏围攻平夏城之际，鄜延路、河东、熙河、环庆、秦凤路或“领兵出界讨荡”<sup>[4]11973</sup>，斩获甚多，或“屯据要害，张耀兵势，使不能深入作过，致贼无利，沮丧遁归”<sup>[4]12000</sup>。

在诸路人马的策应之下，泾原军打退了西夏来犯，再次印证了北宋军队在局部战场上协同作战能力得到了加强。此战之后，宋夏之间的攻防形势发生了彻底变化。北宋军队继续进讨，十一月壬辰，章榘派遣折可适、郭成、李忠杰以轻骑出荡羌，“六道分进”夜袭西夏军事重地——天都山，一战而成，不仅俘获甚多，并生擒西夏统军嵬名阿埋、监军妹勒都逋，仁多保宗仅以身免<sup>[4]12017-12018</sup>。“夏人自平夏之败，不复能军。”<sup>[13]卷九七</sup>

在此有利形势下，章榘继续扩大战果。元符二年（1099）伊始，他率兵进驻天都地区，修建西安州、天都寨、临羌三寨。三城竣工之后，“诸路筑据要害边面，各径直相通毕工”<sup>[4]12141</sup>，天都与熙河边面相接，所包括幅员盖千里，河东、鄜延、环庆边面亦各相通，“使得昔日镇戎军熙宁寨界壕西北环天都山二百里之地”<sup>[14]67</sup>，“自天都至秦州甘谷城，南北一直五百里，幅员殆千余里”尽为宋所有，使得“秦州遂为腹里”<sup>[4]12142</sup>，被曾布称为“不世之效”<sup>[4]12143</sup>。章榘也基本上完成了他战前所制定的夺取天都、控扼横山的战略目标。

#### 四、结束语

崇宁元年（1102），已76岁高龄的章榘“以疾乞罢”，他在泾原四年，凡创州一、城砦九，《宋史》本传称其“立边功，为西方最”，为“一时良将”<sup>[3]10590、10592</sup>。但有学者称：哲宗时期边臣的战略战术并无太多创见，这当中也包括章榘，笔者并不否认这种观点。元祐时期，章榘所陈浅攻扰耕之策，与他同时期的吕大防、范纯粹等人也曾提出过；绍圣时期章榘又积极主张拓边西北，经营葫芦河川以控遏天都、夺取横山，王尧臣、范仲淹、李宪等在不同时期都论证过这一军事战略，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sup>[15]125</sup>，章榘巧妙地总结、利用了前人的宝贵经验，并有所创新，将其运用于实践

之中，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果。此外，章榘不仅谙熟军事，还具有较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清醒地看到了朝廷政治势力的更迭，并根据这一变化在不同时期实施了不同的战略计划，既有效地抵御了来犯之敌，又基本上没有触动决策层的心理底线，确保了其战略部署的顺利施行。经过此次拓边西北之后，北宋所得疆土，“东西殆千里，而新筑之外，更拓二三十里以为堡铺，则形势膏腴占据殆尽”<sup>[16]卷二十五</sup>。北宋所取得的战果绝不是章榘一人之功，而是西北战场诸路将士共同的创举，但“诸路之城戎地，实自泾原始也”<sup>[4]11546</sup>。

注释：

- ①曾瑞龙 《从妥协退让到领土扩张：论宋哲宗朝对西夏外交政策的转变与军事战略的兼容性》，载于曾氏著《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5月，第125~164页；江天健 《宋夏战争中对于横山之争夺》，载于江氏著《北宋对于西夏边防研究论集》，（台湾）华世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85页；米寿祺 《绍圣开边与章榘经营天都》，载于《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
- ②“浅攻之计”在西北战场得到了较为彻底的贯彻，但诸路联合“更守迭出”的战术似乎没有得到重视。据范纯粹称西北诸路之间“各不相知，声迹相疏”。这与北宋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互不统属、各自为战、墨守成规的呆板、僵硬的军政体制有关。根据北宋军队在战术上的这一纰漏，西夏军方对自己的战术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
- ③章榘于元祐七年正月壬子所陈为如何越境打击西夏沿边布防、二月辛酉所论述如何防御西夏军队的围攻，攻守自成一章，但其要义都是强调诸路之间应联合作战，故而将其放在一起论述。

参考文献：

- [1]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 [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2] [美] 约翰·科林斯. 大战略 [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78.
- [3] 脱脱. 宋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4]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5] 曾瑞龙. 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 [M]. 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6.
- [6] 赵汝愚. 宋名臣奏议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7] 王曾瑜. 宋朝兵制初探 [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8] 杨蕤. 西夏地理研究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9] 曾瑞龙. 北宋及拜占庭帝国的弹性防御战略初探——兼论宋夏洪德城战役（1092） [M] // 张其凡，陆永强. 宋代历史文化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10] 李华瑞. 宋夏关系史 [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
- [11] 曾公亮，丁度. 武经总要 [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 [12] 徐松. 宋会要 [M]. 北京：中华书局，1957.
- [13] 王稱. 东都事略 [M]. 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0.
- [14] 江天健. 北宋对于西夏边防研究论集 [M]. 台北：华世出版社，1993.
- [15] 孙武.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 [M]. 曹操，等，注.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6] 陈均. 九朝编年备要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 魏淑霞）